

「干預」與「自主」 ——評《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

● 侯杰、高冬琴

近代以降，長期受「三綱五常」禮教束縛的女性，隨着中國傳統社會、文化結構的不斷嬗變，也發生了歷史性的轉變。其社會地位與主體身份，特別是受教育權、婚姻自主權、參政權、財產繼承權以及戒纏足、追求人格獨立等一系列言論與行動，不斷展現在百餘年來的歷史舞台上，匯聚成一幅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的長卷。



陳三井主編、張玉法總校訂：
《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台北：
近代中國出版社，2000）。

一

近代以降，中國傳統的社會、文化結構在西潮拍岸而來的衝擊與內在變革力量的牽引下，處在「變則通，通則久」的不斷嬗變之中。長期受「三綱五常」禮教束縛的女

性，也發生了歷史性的轉變。其社會地位與主體身份，特別是受教育權、婚姻自主權、參政權、財產繼承權以及戒纏足、追求人格獨立等一系列言論與行動，不斷展現在百餘年來的歷史舞台上，匯聚成一幅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的長卷。

自上個世紀初期以來，就不斷有關於近代中國婦女史的總論性著作問世。1913年徐天嘯撰寫的《神州女子新史》正續編，可謂婦女史最早的總論性研究著作。陳東原的《中國婦女生活史》、姚舜生的《中國婦女大事年表》等各有千秋。二十世紀中後期，海內外學者對近代中國婦女史的總論性研究，又有多種專著出版。其中包括小野和子的《中國女性史——從太平天國到現代》，呂美頤、鄭永福的《中國婦女運動1840-1921》和馬庚存的《中國近代婦女史》。總體而言，由於目前中國婦女史研究愈來愈多元化，各種相關研究日趨豐富和細化，再加上近代以來婦女運動複雜的歷史進程，從整體上把握近代婦女運動的發展脈絡，做到評點全面準確、持論客觀公正而又學術性較強，已殊為不易。由陳三井主編、張玉法總校

訂，集合海峽兩岸專家學者之力而成的《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以下簡稱《婦運史》)，於2000年出版後，引起學術界的普遍關注。該書無疑是近年來中國近代婦女史總論性研究領域中一部極有分量的專著。

二

一般而言，總論性的研究著作因涉及面較廣，單一作者囿於精力，很難對所論述的各個方面都有精深細緻的研究，很難保證學術質量的高水平。《婦運史》一書就很好地解決了通論性著作的這一難題。因為五位撰述者所撰寫的章節都是各自耕耘多年的領域。其次，該書是建立在紮實史料的基礎上。全書各章都徵引了大量史料，基本做到言必有據，決不說無史料支撐的空話。由於史料功夫的專深，全書的具體論斷也格外令人信服。再次，該書還把關注的視角延伸到當代，對剛剛發生或正在發生的與婦女有關的各種運動、事件，進行大膽的評述和獨具特色的闡釋。

除卻書前的序言與書後的索引之外，該書共分六大部分，分別是導論部分：張玉法對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的回顧；第一章，鮑家麟所撰晚清及辛亥革命時期婦女運動；第二章，呂芳上撰寫的五四時期的婦女運動；第三章，梁惠錦所撰抗戰前後的婦女運動；第四章，游鑑明所撰台灣地區的婦女運動；第五章，李繼鋒所撰大陸地區的婦女運動。

在第一章中，鮑家麟用翔實的史料重點描述了晚清至辛亥革命時

期與婦女界相關的各種「大事」，即戒纏足、興女學、女子投身革命及爭取女子參政權。作者將戒纏足、興女學等婦女運動的來龍去脈以及運動過程中的細節問題，巨細靡遺地一一考證清楚，分析、評論絲絲入扣，讀來深受啟發。

呂芳上在第二章中着重論述「五四時期」即從1915年新文化運動到1928年國民革命軍北伐之前的婦女運動。作者認為前期婦女運動由於受到世界範圍內女權運動與新文化思潮的影響，深具批判傳統、爭取女性「人格權」的啟蒙意義。後期則隨着國共兩黨政治思潮與政治行動的影響，婦女運動日益成為整個「國民革命」的一部分，並逐漸納入兩黨的政治指導的軌道。

梁惠錦在第三章中論述了抗戰前後近二十年間的婦女運動發展狀況。戰爭成為左右婦女運動發展的重大時代因素。如果說抗戰前婦女積極爭取自身權益的行動重點，是要求修改法律條文以保證法律上的男女平權，以及要求擴大國民會議代表的女性名額的話，那麼，隨着抗日戰爭爆發，婦女運動受到戰爭影響，其重點則變為更加強調女性的愛國義務。婦女運動多與服務國家的愛國義務有關。戰爭使民族國家意識空前高漲，也使婦女運動進一步納入國家政治之中。

游鑑明在第四章中論述了台灣的婦女運動發展歷史。由於台灣在中國近代史上的地位特殊，所以該地區的婦女運動史顯得更為曲折與複雜。甲午戰爭之後，日本竊據台灣近五十年，日本殖民政府採取諸多措施促進台灣婦女的受教育權、就業權。然而，這些促使台灣婦女

呂芳上認為五四前期婦女運動由於受到世界範圍內女權運動與新文化思潮的影響，深具批判傳統、爭取女性「人格權」的啟蒙意義；後期則因國共兩黨政治思潮與政治行動的影響，日益成為整個「國民革命」的一部分，並逐漸納入兩黨的政治指導的軌道。梁惠錦則指出，隨着抗日戰爭爆發，婦女運動受到戰爭影響，其重點是更加強調女性的愛國義務，婦女運動進一步納入國家政治之中。

由維新派開創的婦女運動，其本質一開始就是試圖通過「解放」女子來達到挽救國家危亡和富國強種的政治目標。辛亥革命後，婦女投身革命和女子對參政權利的爭取，成為這一時期婦運的新動向。五四以後，婦女運動打上了深刻的黨派烙印。1949年後，國共兩黨幾乎都抑制婦運的多元化發展，以造成言論、行動一統的局面。

邁向現代化的舉措，都暗含着「同化」的目標。及至國民黨退守台灣之後，台灣的婦女運動又逐漸被納入國民黨政權的嚴厲控制之下，以至於關乎婦女的言論漸趨一統。進入80年代，隨着「解嚴」和政治民主化的快速推進，台灣的婦女運動與婦女研究逐漸多元化，以女性為主體的自主意識不斷加強。

李繼鋒在第五章中梳理了1949年後大陸婦女運動的發展狀況。從1949到1978的三十年間，政府婦女聯合會的建立以及各級基層婦聯組織的設置，成為這一時期婦女運動的中堅力量。改革開放之後，大陸女性的自我意識逐漸復蘇，各種民間婦女團體日益活躍，而婦聯也開始自身的變革之路，力圖更好地為婦女謀取權益。開放的時代也迎來了大陸婦女運動與世界婦女運動的對話和合作，1995年北京舉辦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就是其體現。時至今日，大陸的婦女運動與婦女研究正朝着多元化的方向蓬勃發展。

三

《婦運史》一書在對百餘年來中國婦女運動的發展態勢和走向予以深刻揭示，使人茅塞頓開的同時，也令人感覺到婦女運動的發展始終處於一種被「干預」的狀態。所謂被「干預」狀態，是指婦女運動在百年來的發展歷程之中，始終受到外在力量的左右和塑造。粗略而言，這種「干預」的力量來自於三個方面。

首先即是泛政治化的強大「干預」。婦女運動從登上近代歷史舞台的那一刻起，就與政治結下了不

解之緣。近代真正意義上的婦女運動興起於戊戌變法時期。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維新志士，鑑於家國淪亡的悲慘現實，號召人們在身體上戒纏足，在智識上興女學，以此「拯女子沉溺之苦」，俾使女子「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遠可善種」。由維新派開創的婦女運動的本質，就是試圖通過「解放」女子，來達到挽救國家危亡和富國強種的政治目標。辛亥革命的成功，掀起了近代中國婦女運動的第二次高潮，婦女投身革命和女子對參政權利的爭取，成為這一時期婦女運動的新動向。甚至為革命所培養的女子暗殺技能，亦是這一時期女子學校教育中的重要內容。至五四以後，國共兩黨相繼注意到婦女運動的重要性。婦女運動受到這兩個黨派政治路線、策略的左右。隨着國共兩黨逐漸成為中國的主要政治力量，婦女運動也因政治上的分野而打上了深刻的黨派烙印。國民黨根據自己的意識形態需要，成立婦女工作指導委員會，以加強對婦女運動的指導和塑造。共產黨也依據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需要，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指導婦女運動的政治體系，比如婦女聯合會。納入國共兩黨政治體系之中的婦女組織與婦女運動，在政治力量的左右下，自主性受到極大削弱。1949年之後，大陸和台灣官方對婦女運動的「干預」更為明顯。兩黨都長期抑制婦女運動的多元化發展，以造成言論、行動一統的局面。政治力量對婦女運動的束縛直到近二十年來才逐步消退。

其次，近代中國不斷變遷的時代也深刻影響了婦女運動的發展。

自婦女運動興起之時，即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婦女運動由於本身就是近代中國社會轉型的產物，因此深受百年來社會變遷的影響和塑造。正所謂一時代有一時代的婦女運動。戊戌變法時期，受康、梁等改良主義者的影響，婦女運動的內容與話語主要集中在戒纏足、興女學與富國強種之上。辛亥革命時期，女子參政權利成為婦女運動所關注的新內容。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對男女社交公開、男女平權以及婚姻自主、家庭革命等諸多議題比較關心。抗日戰爭時期，如何令女性具有愛國能力成為婦女運動的時代挑戰。1949年之後，大陸與台灣的婦女運動都有過一段高度受政治干預的時期，蓋因這一時期兩地都處於「政治掛帥」階段。80年代前後，大陸進入改革開放時代，台灣則進入「解嚴」後的時期，兩地婦女運動也隨時代的變遷，而進入女性自我意識復蘇、婦女運動日趨多元化的新階段。綜而言之，百年來中國婦女運動的一大特徵就在於其具有很強的時代性。

再者，這種「干預」力量來自於西方世界思想、價值觀對中國婦女運動的影響。1840年代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許多傳教士來華傳教，促進了近代中國婦女運動的展開。以晚清婦女運動的重要內容戒纏足與興女學為例，中國最早的廢纏足會為1875年廈門教會的光照牧師(Rev. John MacGowan)發起的「戒纏足會」。中國最早的現代意義上的女學同樣是傳教士所創，1844年，由英國「東方女學促進會」會員艾迪綏女士(Mary Aldersey)創設於寧波的艾迪綏女塾，為中國第一所現代女學。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是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少見的極具啟蒙意義的時代。這一時期的婦女運動受西方第一次女權運動與西方思潮影響甚深。比如著名刊物《新青年》上關於女子貞操論的爭論，實際上就是對日本婦女運動先驅謝野晶子的文章〈貞操論〉的回應。再如當時知識界借「娜拉出走」探討婚姻自主問題，其思想來源則是挪威作家易卜生(Henrik Ibsen)的劇作《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至於這一時期各種西方理論諸如實驗主義、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等對婦女運動的影響，更是不勝枚舉。進入二十世紀80年代之後，隨着政治力量對中國婦女運動「干預」消弱，在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之下，西方女權運動的行動與理論，再次成為中國婦女運動借鑑和接受的思想資源和現實經驗的場域。目前，方興未艾的有關婦女的各項活動，就深刻體現着西方世界對於中國婦女界的影響。

四

《婦運史》不僅記述了百餘年來中國婦女運動被「干預」的複雜而曲折的歷程，同時也展現了婦女運動漸趨「自主」之路。婦女運動的被「干預」與「自主」，並非處於矛盾的對立狀態。相反，近代中國的婦女運動正是在政治、時代和西方的「干預」下逐漸走向「自主」的。這種「自主」首先表現在女性從男性手中接過婦女運動的旗幟，成為婦女運動的主體。如前所述，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始於戊戌變法時期以康、梁為代表的男性知識份子。及至辛亥

傳教士東來促進了近代中國婦女運動的展開。以晚清婦運的重要內容戒纏足與興女學為例，1875年廈門教會發起的「戒纏足會」是中國最早的廢纏足會。英國人艾迪綏女士創設的女塾，則為中國第一所現代女學。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婦女運動深受西方第一次女權運動與西方思潮影響。進入二十世紀80年代之後，西方女權運動再次成為中國婦運借鑑和接受的思想資源和現實經驗的場域。

《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一書在論述近代中國婦運時所採取的時間框架，乃是中國近現代史的總體時間劃分法，將婦女運動分別放置在晚清辛亥時期、新文化運動時期、抗日戰爭時期等等，無形中消弱了婦運自身發展的內在連續性。若能以婦女運動本身發展進程的特點來確定有意義的時間劃分體系，以取代這種宏大的時間劃分方法，似乎會更接近歷史本身。

革命時期與五四時期，男性仍然在婦女運動中扮演着極為重要的角色。但是，隨着戒纏足、興女學、婚姻自主等婦女運動的興起，女性在經歷了身體解放(放足)、獲得受教育權、得以參與公共領域之後，如秋瑾、呂碧城這樣鳳毛麟角的女性精英，開始呼籲爭取女性權益，而愈來愈多女性加入到婦女運動行列之中，最終匯成浩浩蕩蕩的婦女運動洪流，女性成為婦女運動的主體。

其次，如前所說，近代中國婦女運動的一大特性即是強烈的時代性，婦女運動常常呈現出與時代變遷相適應的新內容。但是與此同時，婦女運動在發展過程中也形成了許多持之以恆的重要議題。這些「經典」議題包括廢除纏足、女子受教育權、女子就業權、婚姻自主、法律上的男女平權等等。自婦女運動在近代中國展開之後，這些「經典」議題被歷史性地逐一提出。又因其與女性的基本權益休戚相關，也是女性爭取其他權益的基礎。從某種意義上，這些「經典」婦女議題的形成，是近代中國婦女運動走向「自主」的最重要內容。

其三，近代中國婦女運動走向「自主」的又一成就在於：儘管在歷史進程中受到重重「干預」，但女性追求自我意識的傳統，一直延續至今。尤其是現今隨着政治「干預」減弱，各種民間婦女團體與婦女研究紛紛出現，婦女運動日益呈現多元化的格局。不僅女性的基本權益受到關注，女性的主體意識與對社會性別制度的思考也格外受到注意，甚至出現諸如女性情欲自主這樣「前衛」的女權議題。各種迹象表

明，當代婦女運動正向前所未有的「自主」之路邁進。

五

任何學術專著都會有疏漏或見仁見智之處，《婦運史》這部出色著作也難免有一些白璧微瑕。比如，該書在寫作形式上採取五位專家各撰一章的方法，就各章內容來說，無疑都有較高的學術水準。但是通觀全書，缺乏對百年來婦女運動的總評文字。讀者在徜徉全書過後，猶覺得言不盡意。此外，該書在論述近代中國婦女運動時所採取的時間框架，乃是中國近現代史的總體時間劃分法。這種時間體系將婦女運動分別放置在晚清辛亥時期、新文化運動時期、抗日戰爭時期等等，無形中消弱了婦女運動自身發展的內在連續性。依筆者之見，以婦女運動本身發展進程的特點來確定有意義的時間劃分體系，以取代這種宏大的劃分時間方法，似乎會更接近歷史本身。還有，此書在論述1949年之後大陸地區婦女運動之時，似乎稍顯薄弱。但綜而言之，《婦運史》一書值得一觀，可以引發很多思考。

侯杰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主要研究中國宗教史、社會性別史等。

高冬琴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中國近代史專業研究生，主要關注中國社會史、社會性別史。